“江湖儿女”的雾中行走

——路内长篇小说《雾行者》的叙事美学

□王雪瑛

“消失的人出现，出现的人消失，”这不仅是周劭对梦境的记忆，也是对他的生活的隐喻。周劭由南方初冬的海滨K市被紧急调往千里之外大雪封冻的H市，他是美仙瓷砖公司的外仓仓管员，经常6个月便更换城市，通过一台传真机与总部联系，他离开一个城市，抵达另一个城市，他行走在一个时代，回望着一个时代，他接受了作家路内的邀请，出现在他的长篇小说《雾行者》中，他不断地流动，不停地行走，没有预期的相遇，没有告别的消失，都是他人生中的常态，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状态，也是一代雾行者的人生经历。

这是呈现一代雾行者跨越世纪的长篇小说，他们的青春在世纪交替中绵延，路内叙写的故事在1998年至2008年的十年间展开。这十年正对应于中国的工业时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十年；这十年也是普通人生活变化最大的十年，也是小说的核心人物人生漂移起伏的十年。他们的人生在时代的洪流中穿越，被快速的变动裹挟着，犹如在大雾中前行，文学是他们漂移中的微光。

周劭、端木云、辛未来是大学同学，他们正临毕业时，遇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之年：毕业生要面向人才市场，自谋职业。他们是普通高校的毕业生，找到合适的职业实非易事。离开校园，走向社会，意味着文学青年坠入现实，刚刚建立的自我与时代的碰撞开始了，粗粝现实与内心愿景狭路相逢，谋生与理想的短兵相接，他们必须应对生活的磨砺。路内的目光注视着周劭和端木云他们的人生轨迹，他们的行走与中国的工业时代相互叠合的状态。

铁井镇坐落在上海、江苏、浙江交界处，成了数万外地打工仔的集散地。美仙瓷砖公司是铁井镇开发区最大的一家台资企业，主营瓷砖和人造大理石。常规情况下约有1200名蓝领工人，100名白领职员，以及数量难以统计的外地分销处销售员。如果说毕业后在药店做“销售”是他们谋生的序章，那么走向铁井镇，入职美仙瓷砖公司，做外放仓管员是他们自我生存的重要篇章。相对于穿灰色制服的工人发疯似的干活，他们的生存条件相对优越，但是他们独自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每隔半年调换工作城市，在全国范围内游荡，不断地与孤独相遇，成为工业时代的“江湖儿女”。

《雾行者》不是武侠和传奇小说，路内不会以穿越来逃离现实的粗粝和骨感，而是追随着他们的雾中行走来揭示他们的生存，打量他们的内心。“江湖儿女，萍水相逢”是他们面对变动不居的生活境遇的自嘲与安慰。所谓江湖儿女，隐含着青春的疼痛、人生的漂泊，但又是困顿中不乏活力，以洒脱掩尽苍凉。流动与迁移、城市与乡镇、车站与库区构成了小说的内在肌理，“江湖儿女”构成路内的叙事美学。

路内在访谈中表示，“改革开放作为文学题材而言，人口流动是其中最具有写作意义的现象，它是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带动了观念和行为的变化。”人口流动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也是路内理解20世纪90年代的关键词。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世纪之交展开，人口流动中，不仅有体制内的工人下岗，也有农民工进城，还有大学生毕业。周劭、端木云们置身于人才市场，人口流动与职业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漂泊感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的内心情结。路内以江湖儿女、萍水相逢构成鲜活的文学场域，对经历人口流动的青年生存境遇的叙写中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生动表情。

不管在K市、H市还是重庆、上海，仓管员频繁变动中的工作节奏，带来身不由己的生活状态，大部分人会在3个月内离职，不可能建立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和情感关系，他们之间的邂逅与失联，短期关系成为基本模式，带来内心情感结构的变化。

身份证、学位证书是个人现身于社会的重要证明，也是用人单位录取员工的主要证明，有人为了重新开启自己的生活，有意隐瞒或者造假学历和身份，在小说中被标注为“假人”。“假人”出现在美仙公司，出现在那个时代流动的生活中。“假人”以一种现实可行的方式生存，又会在突然的变故中消失，真实的相遇，突然的失联，往往是江湖儿女人生经历中的真实体验：有的人是永久地消失，比如林杰；有的人消失了又出现，比如辛未来。“每一个邂逅的人都是残缺的文本”，小说描述了他们在短暂交集中，留下的大量的空白用回忆来补充，同时也为后续情节中重逢和峰回路转预留了伏笔。

《雾行者》由五章组成，第一章《暴雪》与第四章《变容》的主人公是周劭，第二章《逆戟鲸》与第五章《人山人海》的主人公是端木云。他们共同构成了第三章《迦楼罗》中的双重主人公。端木云和周劭是小说人物群体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曾经是关系最密切的同学，毕业后同住过出租房，在上海不同的药店里卖过“药”，一起从上海到了铁井镇，成为美仙公司在不同城市的外仓员，在起伏动荡的生活中，他们通过邮件和电话的联系时断时续，周劭渐渐地感到了陌生与距离。“我们好像走进了另一个时代，在这另一个时代里我们已经变成了陌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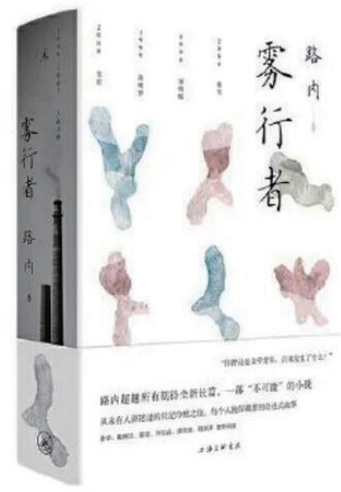
周劭与戴红围巾的女孩凌明心相遇于库区的墙角，告别于H市的高铁站。他们有过身心的交流。高铁票和假身份证，专程送她到车站，是他送给她的告别礼物。凌明心也是一个“假人”，但他们的邂逅与交往是真实的。周劭与凌明心是萍水相逢，是一件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爱情；周劭与辛未来是大学时代的同学加恋人，他们曾经的亲密交往在周劭的心里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辛未来也成为路内设置悬念，展开情节、结构整部小说的特殊人物。

辛未来是校文学社副社长，床头贴着茨维塔耶娃的素描头像，去人才市场找工作时会拿出自己的诗作给招聘管过目。大学毕业后，她与周劭有过一段艰辛的同居生活：有历史的筒子楼，有霉味的出租屋。没有稳定工作，入不敷出的拮据……辛未来拿着歌词去影视公司找工作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所踪……

周劭是火车司机的儿子，在他看来，辛未来的失联犹如“一列开进隧道却再也没有出来的火车”。真实的交往，突然的消失造成的悬念与思念漂浮在他的心里。她的故事没有就此结束，她的重现如同在回答《雾行者》腰封上印着的问题：“你曾经是文学青年，后来发生了什么？”辛未来在失联十年后，终于满血复归了，她作为卧底记者，潜伏于一家肉类加工厂收集证据，豪情满怀地自称“中国最像女革命家的就是我们这些女记者”……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女青年谱系中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

路内的小说有着俗世的根底，丰富的生活细节，写实的各种场景，真实的人生困境，个体青春面对骨感的现实，漂移的生活，内心陷入种种选择与挣扎。当你被他的逼真写实的笔触带入人物的生活，想象着这就是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的时候，他又会以直接探讨文学虚构与真实原型的方式间离着你的联想，他以小说中的人物，比如端木云文学写作的方式探讨着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端木云出生于乡村，全家为了资助他上大学，姐姐被迫嫁到李河镇，他的身上有着文学青年的敏感、天真、倔强和忧郁。在大学毕业前夕，他应文学编辑沉玲的邀请参加了杂志社的笔会，结识了小川、玄雨等“文学青年”，后来他们并没有成为专职的文学从业者，但从没有放弃文学对生活的观照、对自我的审视。文学让他们保持着内心的丰富、超越的力量，抵抗着生活的沉重、现实的匮乏。



路内并没有将“文学青年”标签化，而是让每一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个性与选择，他们不同的行走方式，拷问着人性的不同层面，小说勾勒出文学青年在雾中行走的群像，岁月在流动，时代在变化，他们的生存方式也在变化，他们的自我也在坚守与调整，选择与适应中发生变化；小说用十年的追踪完成了文学青年的命运联展。

“这样一条公路，历史并不长久，它仍然是被塑造的产物，由多条公路拼接连贯而成，并赋予其固定的编号：318。它的空间存在就像时间的拼接术、人生的拼接术……我想象有这么一种长篇小说，经历不同的风土，紧贴着某一纬度，不绝如缕、义无反顾地向前，由西向东沉入海洋，由东向西穿越国境。我指的不是公路小说，更不是那种字面意义上的伟大文学，事实上，一级公路的宽度仅是双向四车道，与山脉河川不可同日而语。对某些人来说，这一诉说着‘我’的象征之物意味着可能去往极远之处，获得一种并不算太廉价的解脱，但也仅仅是意味而已。”

这一段将长篇小说理想与318公路并置，构成“互文”的论述，出现在小说的第五章《人山人海》中，这是端木云在西藏时的内心独白，更是路内的小说美学，不仅流露了文学青年对生活与文学的领悟，更是表明了路内驾驭小说的能力，将真实公路与人生行走、现实生活与内心思绪、时代变化与青春情结、江湖儿女的境遇与小说叙述的意境全都连接起来，形成意象恢宏的文学星图，赋予《雾行者》丰富的审美内涵。文学没有外在于他们的生活，文学不是脆弱中的逃避，而是他们日常中的思索、承受后的超越。他们的雾中行走的状态和意象不仅有着迷惘与困顿，还有着苍凉之后的雄浑与慰藉。路内的叙述在文学与生活、时代与自我的碰撞中展开，有着丰富的层次、真实的质感。《雾行者》犹如回首青春走过爱与痛交织、理想与现实对弈的长路中的驿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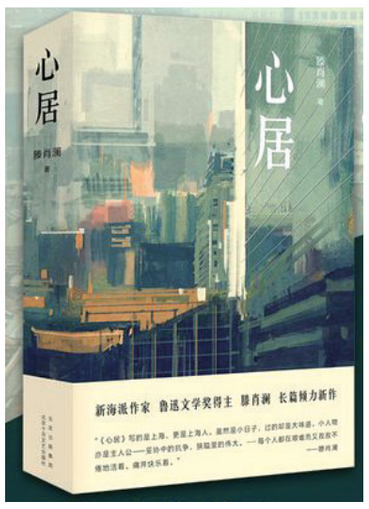
《心居》：烟火气中的沪味人生

□胡笛

魔都，居大不易。滕肖澜的《心居》写的是此时此刻的上海，是我们共同经历的房价快速飞升的时代。房子是我们现代都市人最真切的需求和焦虑，尤其是年轻人，用房子反映上海老百姓的生活是一个最直接的视角，尤其是再聚焦到一个有上海本地人、重回上海的知青、外地人这样一个都市家族。围绕房子展现的既有个体命运在时代中的沉浮，也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羁绊。《心居》让读者看到这座城市最日常的一面，看到丰富复杂的世情和人性。正如小说里写道：“这是个捉摸不透的世界。房子是上海人绕不过去的话题，滋生出各种情绪，各种际遇，真正是命了。”

小说从一场家宴开始，伴随着一道道上海式样的家肴，顾家的几代人几乎全部出场，他们聊房子孩子，也聊国家大事。喜宴、满月酒、豆腐饭，大大小小的宴席也上演着顾家人的生老病死。顾老太太有三个子女顾士海、顾士宏、顾士莲，在那个房子还只意味着住所的年代，家境丰裕的小妹曾经让给无立足之地的返沪知青大哥一套房子，而今小妹患病境况窘迫却并没有得到大哥对等的关心。房子在这里是引发顾家上一代矛盾的重要导火索，吃吃说说的寻常聚会之下潜伏着随时浮出水面的情感暗礁。顾士宏的外地儿媳冯晓琴带着妹妹在顾家生活，对她们而言，在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意味着真正的扎根，冯晓琴未婚先孕嫁给了有些腿疾的顾磊，她希望顾磊能够努力挣出属于夫妻俩自己的房子，奈何顾磊安于父亲和同胞姐姐顾清俞的庇护并不进取，偶然的争吵引发了顾磊的意外死亡，冯晓琴开始自谋出路，令人意外的是，她选择了经营社区的养老机构。大姑子和弟媳是顾家年轻一代的矛盾主体，她们相互提防又能在某种境遇下相互理解。顾清俞作为都市精英，房子早已不是刚需而是意味着生活品质的提升和投资的回报，假结婚买房的过程中她偶遇到自己爱慕多年的施源，他精神契合但物质落魄，另一个追求者展翔物质丰硕但文化底蕴不足，顾清俞的情感归属也成为吸引读者的悬念。

房子作为一种空间标识，在小说中是人物身份地位和经济状况的表征，它所处的地段、内部的装潢等无一不在诉说主人的故事。比如施源，家住在底楼亭子间总共不过30多平，煤卫共用。但是书架、钢琴、鱼缸等提醒着他们曾经也是大户人家，有良好的教养，施源的父母甚至觉得顾清俞配不上他们曾经的家世。在许多的海派文学作品里人物的出场都自带空间标识，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中弄堂女儿王琦瑶、金宇澄的《繁花》中老洋房里的沪生。同时，房子作为一种“物件”，具有卡尔维诺所说的叙述功能，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它是一个外露的，可见的标志，指示了人物之间或事件之间的联系……依据交换某种物件的拥有权展开情节”。顾士莲因为房子和哥哥产生心结，顾清俞与施源因为买房而相遇，顾士海的儿子顾昕原本以为与领导女儿葛玥结婚获得了改变仕途入住豪宅的机会，却又因为老丈人的落马打回原地，房子在某种程度上也侧面体现了人物处境和命运的变化。



作者选择以一个城市家族作为切口，既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特殊性在于这个家族同时囊括了上海原住民、返沪知青以及新上海人三种不同类型，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阶层的奋斗史，同时作者用大量日常生活的细节来支撑他们各自的生活轨迹。小说中对于知青顾士海的返沪经历没有太多历史叙述，而是通过他高超的编制手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际遇来表现他命运的起伏，荒诞岁月里他曾因此断送了前途，蹉跎一生丧失了家族长子本该有的权威和尊严，只好淡漠应对家族的人情来往。正因为作者赋予人物生活的逻辑，读者才能有同情的理解。外地媳妇冯晓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丽的日子》中的姚虹，她们都来自底层且隐瞒自己的“前史”，那个姚虹隐瞒的孩子“满月”在《心居》中就冯晓琴所谓的“弟弟”冯大年，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冯茜茜，他们跟随姐姐来到上海，或者自食其力留下或者过界越线而离开，刚好是两种不一样的结局。冯晓琴的出彩，在于她的复杂性，有心机手段的同时她还有善良和义气，张罗“不晚”这个养老机构收留一群弱势群体，与她谋利的初衷截然不同，善与恶不是脸谱化而是共存在人物身上，用张老太的话来形容她“吃相差点，人是好人”。她希望弟弟妹妹上进成为新上海人，同时也希望他们守住底线，爱惜羽毛。《心居》还有一个普遍的社会意义，它是当下都市家族关系的研究样本，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生育政策，当下大都市大家族的亲缘关系越来越松散，四世同堂的故事日益稀少，尤其是独生子女一代对于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伦理更难体会。顾老太太一直像个背景式人物，但她才是家族团聚的隐形纽带，临终前她对女儿的劝解才使得顾士莲放下对大哥的心结，作为一个母亲，她并不是看不见儿女之间的矛盾，而是自己年事已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她所希望的是子女们都能过得去，这个临终对话，让顾老太太的形象顿时鲜活起来，种种难言之隐俱是人之常情。家族是一个可以不断书写的母题，家族成员之间那些说不清算不明的情感羁绊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冯晓琴选择经营养老机构“不晚”的设定看似有些突兀，但通过这个养老机构中串联起丁克夫妻和退休老人的晚年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作者对于现代家庭结构之下老年人归宿的一次实验性探讨，这是一个可以深入挖掘的故事生长点。

滕肖澜擅写市民社会的人情世故、饮食男女的爱恨情仇，关注的是烟火气中的沪味人生。如果要在文学谱系中定位，她更像是延续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世情传统，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她的小说虽写日常却极富戏剧性，尤其是爱情，柳暗花明又一村。她坦言，“真正的爱情小说太难写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可爱情又不可能过于天方夜谭，离现实太远，那便不是爱情而是童话了。所以我通常不直接写爱情，而把重点放在爱情背后的东西上……爱情有目的的，是别的东西的介质。”所以她的爱情故事里少有童话，顾清俞与施源意外重逢后，闺蜜告诫她“男人比女人强，一点问题也没有。倒过来就比较麻烦。”他们之间有爱情，但在爱之中，他们还需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个性，施源选择结束这段关系是符合他人物性格的，但作者似乎对于笔下的人物有些于心不忍，结尾处让施源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居所。另一个通过爱情和家变成长的是葛玥，父亲落马后她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生性软弱却因为做了母亲反而无所畏惧，她挽救婚姻无果后决定离婚，又在丈夫入狱后依然去周旋营救，小说在她刻意接近小卢投其所好唱越剧时戛然而止，“你喜欢听越剧吗？《我家有个小九妹》或者《桑园访妻》，我唱给你听。”这个人物的故事继续下去必然也是充满戏剧性的，作者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心居》与滕肖澜上一部小说《城中之城》是截然不同的题材，后者写上海的金融行业，两代金融人信仰与欲望之间的抉择。但无论是何种题材，作者都能用扎实的生活做底，支撑起其中的故事和人物，展现具有烟火气的沪味人生。

海上的一座坚定的岛

——甫跃辉读札

□何言宏

甫跃辉是这些年来越来越以其创作实绩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恰如有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惊喜地发现和注目于一座岛屿的感觉，当然在目前，这还只是一座小小的年轻的岛屿。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以海量的网络文学和赛博文学、AI写作等为代表的新兴文学形态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既往的文学版图，在体量方面使传统的文学写作相形见绌，更是在关于文学的基本观念方面冲击和挑战着既往的“文学性”。这一段时间，我经常会读到一些研究和推崇网络文学人士的观点，要求将网络文学所突出具有的可读性、产业性及所谓的“爽点”“网生性”等指标纳入文学评价的基本标准，而将我们以往对文学语言和审美性的强调大幅度降低。目前的网络文学波涛汹涌，“大神”频现，AI写作也异军突起，频频吸睛。但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中，作为一位“80后”作家，甫跃辉却很坚定地固守着传统的文学写作与创作道路，不仅与上述的一切迥然不同，保持着距离，甚至从其文学起步之初，就迥异于当时作为热点性现象与时潮的“80后”青春写作，执着于其所选定的传统性的纯文学道路，因此还被其同一代的批评家称为是“‘80后’传统作家”（金理）。我注意到，在谈到甫跃辉的选择和坚持时，项静也曾经说，“与出版、媒体、影视一体化的市场运作方式不同，甫跃辉的被关注是文学在另一个层面上的薪火相传：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技艺的研习”。但是现在看来，随着文学生态的巨大变化，甫跃辉的选择与坚持却显示出更加重要的文学意义，那就是对我们既有的文学性的坚持，这样一座年轻的海上小岛以及与其一样坚持传统的文学写作与道路的作家们坚守与捍卫的，实际上却是饱受挑战与冲击的传统的“文学性”。在我们的文学文化与文学场域中，两种文学性，目前正处于激烈的博弈与冲撞之中，于此两间，甫跃辉的选择与坚持，便显得尤其可贵。

在我们这个各方面都面临着变局的转型时代，处身两间，似乎成了我们的历史宿命。但于两间之中常作取舍，常有彼此的参照、往返、对话、相望甚至批判性的驳难与审视，在甫跃辉这里，似乎有着更加特别的内容。甫跃辉是云南施甸人，生长于乡间，后来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上海作家协会工作。这样的人生经历作为一种很重要的因素，使得甫跃辉的文学世界在题材内容上明显可以划分为乡村书写与城市书写两个方面，人们对甫跃辉的讨论，也常注意到这一点。他在新近创作的主要收集在其《万重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一书中的中、短篇小说，同样对此有所体现。像其中的“孩子们”“父辈们”等辑中的几篇小说，就是属于乡村题材，写的是其青少年时代的乡村记忆与成长经验，此间情怀，经常使我有所触动。但我在这里更想重点讨论的，却是《万重山》“现实种种”一辑中以李生为主要人物形象的《云变》《断篇》《隐我》和《血鸽》等中、短篇小说。我们知道，在甫跃辉以往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和独特的人物形象，即《动物园》《丢失者》《晚宴》等小说中的顾零洲。顾零洲这个人物形象，不仅体现着甫跃辉个人，同时也体现着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经验与精神处境，具有特别的典型性，因此，甫跃辉的这些作品也被评价为是在“为顾零洲这一代青年立传”（黄平），颇受好评。实际上，在甫跃辉的其他作品中，比如李生和陈昭晖等人物形象，也都是类似于顾零洲的“这一代青年”，所以在小说集《每一间房舍都是一座烛台》（2015）出版时，甫跃辉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干脆将收录其中的三部小说的有关人物全部改名为“顾零洲”。对此，甫跃辉在该书的“后记”中曾经这么说过：“本书收录的三部小说，都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写于不同时期，男人的名字本不相同，这次出版，有朋友建议我把他们改为同一个名字，我给改成了‘顾零洲’。他们确实就该共同使用这名字——我不禁恍悟，原来李生也好，陈昭晖也罢，这些名字不同的人，本质上却是一个：从乡村来到城市的、正走向中年的、虚弱虚伪虚无而又有所固守的男人。这几年，我写了好几篇关于‘顾零洲’的小说。顾零洲不是我，他是一盏灯，指引我去‘解开’他，也指引我走向‘我’，看见‘我’，让我和‘我’纠缠，彼此讨伐和安慰”。

这时候的甫跃辉似乎才“恍悟”到，他所塑造的顾零洲形象，已经具有为这一代青年立传的意义，也为我们的文学形象谱系增加了一个新的典型。所以《万重山》所收小说中的李生形象，正如我们前引所说的，其与顾零洲，“本质上却是一个”，“李生”只是“顾零洲”的另一个化名。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正可以通过这几篇作品来考察一下作家对此一类型人物形象塑造的最新变化。

《万重山》中《云变》诸篇里的李生，仍然与甫跃辉之前很有影响的一篇小说《巨象》中的李生及顾零洲们一样，有着基本一致的身份形象和精神性格，是一个“从乡村来到城市的、正走向中年的、虚弱虚伪虚无而又有所固守的男人”。在社会身份上，李生是一个借由高考升学才从乡村来到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就学或就业的年轻人。其虽落脚于上海，却又很难真正地融入上海，成了相对于“京漂”而言的一枚“海漂”。一方面，李生竭力地想融入上海，经常想通过婚姻的方式真正切实地进入上海，从而被上海接纳，因此，生长于上海本地的女友“在他心中不知不觉已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巨象》），他与这些女友（如《云变》和《断篇》中的“小文”）的交往中，也总显得唯唯诺诺，委曲求全，盼遂所愿；但是在另一方面，李生对上海努力融入的过程，又不断经受着诸多挫折、诸多伤害与失败。不仅是在恋爱与婚姻中，就是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外地人”，李生也曾遭受到歧视，因此还与人产生过冲突（《断篇》）。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中，李生会时常想望着家乡，会用美好的乡村世界来抵御、弥合或逃避着都市所带给他的创伤。恰如其在《断篇》中，当他局促不安地站在女友小文家的客厅时，一次又一次地想起老家，想起“老家那些玉米林，烈日底下，宽大的叶片闪耀着光芒。光芒自由自在，他在玉米林里，光着脚丫跑啊跑，也一样自由自在”。这些境况，形成了李生自卑、敏感和复杂的性格。正是通过对李生的“海漂”经历与其性格的挖掘和书写，甫跃辉的小说从社会学意义上的乡村视角批判着城市、审问着城市。

但是在实际上，李生与城市的龃龉和李生的精神性格，并不只具有社会学内涵。像在《巨象》中，小说的基本主题更多的还是偏重于道德与伦理学方面。作品中的李生在与城市女友婚恋失败后，转而通过对小彦的感情戏弄与侵害来获得某种补偿性的满足和优越感，在此过程中，李生的关于“好人”的自我道德拷问和包括梦境在内的动荡不安的心理剖示，使得《巨象》明显具有巴赫金所指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那样的复调性与对话性。我以为在这样的意义上，《巨象》中的李生，就是小一号的拉什柯尼科夫。

而到了《万重山》中的《云变》等近作中，李生的形象在包含着城/乡冲突的社会内涵及道德内涵外，又被甫跃辉明显强化了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哲学心理内涵，无疑是对其以往顾零洲/李生这一类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超越。这些作品中的李生，都是一个很难真正地融入群体和社会的孤独个体，是一个零余、羸弱、无能的赤裸生命。他要么就像在《云变》那样，不仅惊恐不安地深怀隐痛，独自面对现实生活（“花仙子”、小文之母）、个体记忆（杨老师）和自己想象中的死亡，还会不时地“对自己生出几分厌恶”，一遍又一遍地体验着虚无；要么就像在《断篇》和《隐我》中那样，近乎荒诞和绝望地追索着失忆（“断篇”）的自我或可能的自我；或者，甚至像在《血鸽》中那样，从生存的悲剧中一走了之……至此，我们能很清楚地感觉到甫跃辉对顾零洲/李生这一人物形象系列的塑造，已经不仅是在“为顾零洲这一代青年立传”，而是更加具有超越性的哲学人类学意义，是对存在的某种勘探，是我们如前所引的他自己所曾说过的对于人物的某种“解开”，以及这种“解开”的过程中与“我”自身的“纠缠”，以及这种“纠缠”中的彼此对话，“彼此讨伐和安慰”。这样的掘进与超越，无疑是文学史上以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经典作家们的基本经验，循此进路，虽显“传统”，虽多艰难，但一定会在我们人物塑造已不太受重视、精神重力也难得一见的时显浮泛的文学海洋中，取得真正扎实的成就。在此意义上，在目前的文学海洋中，甫跃辉不仅是一座年轻的岛，还是一座坚定的岛、保有深度与重力的岛。